

中国 职业技术 教育史

李蘭田 主编 王萍 副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

主编：李蘭田

副主编：王萍

编者：李蘭田 王萍
林晓阳 汪振世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京) 112 号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

李蒲田 主编 王萍 副主编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7.5 字数 930 000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 035

ISBN7-04-004589-3/G·357

定价 21.70 元

编写说明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主要介绍清末以来的近代、现代职业技术教育。对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只在引子中作简单介绍。

本书主要从 1862 年(清代同治元年)写起,其中经过中华民国时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写到 1988 年为止)。在写法上,按照历史发展年代顺序分时期叙述,分阶段为章。各章有附录,包括当时的重要文献和资料。另列大事年表。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已发展成一个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为主体的、包括高级、中级和初级的学校、职前与职后的学校相结合的多层次多形式的体系。本书包括了这一体系中的各级各类职业技术学校。

书中对职业技术教育,均使用当时在各个不同的发展时期的法定名称,如实业教育、职业教育、中等专业教育、技工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全书统称为职业技术教育。

本书力求提供翔实的史料,系统地叙述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过程并探讨其规律,总结经验,反映其伟大成就。限于作者水平,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本书所引用的资料、数字,一般是从政府有关文件或资料中摘录的,少量的摘自报刊和有关部门或学校的资料。有关基本情况的数字,因统计口径、时间有所不同,可能与其他方面的统计有出入,请读者使用时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全国职业技术教育的统计数字比较完整,按照年代列表附后。为了避免重复,在各章的文字叙述中,一般则不再完整引用这些统计数字了。

台湾的职业技术教育简史,作为附录介绍。

本书由李蘭田、王萍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林晓阳、汪振世。

林晓阳编写第 1 至第 7 章。

王萍编写引子和第 8、9 章,并对全书作了文字润饰。

汪振世编写第 10 章。

李蘭田编写第 11 章和台湾职教简史。

李蘭田和汪振世共同编写第 12 章。

编写者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

1992 年 12 月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实业教育的萌芽

(1862—1902 年)

一、背景	(5)	七、关于新旧教育的争论	(14)
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	(8)	附录：	
三、学校的设置与学制	(9)	1. 船政大臣沈葆桢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 1874 年 4 月 5 日(同治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 (16)	
四、科类划分、课程设置与教学设施	(10)	2. 养蚕学堂(浙江蚕学馆)章程 1897 年 (光绪二十三年) (17)	
五、教师、学生与毕业生出路	(11)		
六、教育行政管理制度	(13)		

第二章 实业教育制度的建立

(1903—1911 年)

一、背景	(18)	1 月 13 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50)	
二、教育宗旨	(19)	4. 奏定艺徒学堂章程 1904 年 1 月 13 日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52)	
三、学制	(20)	5. 奏定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 1904 年 1 月 13 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53)	
四、学校的设置与经费	(25)	6. 奏定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1904 年 1 月 13 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54)	
五、科类与课程	(30)	7. 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1904 年 1 月 13 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58)	
六、教员、学生与毕业生出路	(34)	8. 奏定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 1904 年 1 月 13 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62)	
七、行政管理制度	(37)	9. 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 1904 年 1 月 13 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64)	
八、关于新旧教育的争论	(40)	10. 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 1904 年 1 月 13 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73)	
附录：			
1.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 1904 年 1 月 13 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1)		
2. 奏定实业学堂通则 1904 年 1 月 13 日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9)			
3. 奏定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1904 年			

第三章 实业教育的改革

1912—1921 年(民国元年至十年)

一、背景	(82)	二、教育宗旨	(83)
------------	------	--------------	------

三、学制	(85)
四、学校设置与经费	(89)
五、科类与课程	(93)
六、教员、学生与毕业生出路	(97)
七、教育行政管理制度	(99)
八、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	(101)
九、勤工俭学	(102)

附录：

1.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	(106)
2. 专门学校令	(108)
3. 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	(108)
4. 实业学校令	(109)
5. 实业学校规程	(110)
6. 实业教员养成所规程	(114)
7. 师范教育令	(114)

第四章 职业教育的兴起

1922—1926年(民国 11 年至 15 年)

一、背景	(116)
二、教育宗旨	(117)
三、学制	(117)
四、学校设置	(120)
五、科类与课程	(121)

六、教员、学生与毕业生出路	(122)
七、教育行政管理制度	(123)
八、陈嘉庚与集美职业教育事业	(124)
附录：	
大总统令：学校系统改革案	(126)

第五章 职业教育的发展

1927—1949年(民国 16 年至 38 年)

一、背景	(129)
二、教育宗旨	(129)
三、学制	(131)
四、学校设置与设施	(135)
五、科类与课程	(147)
六、教员、学生与毕业生出路	(151)
七、教育行政管理制度	(154)
八、师范教育	(158)

1. 专科学校组织法	(161)
2. 修正专科学校规程	(161)
3. 职业学校法	(164)
4. 修正职业学校规程	(165)
5. 师范学校法	(172)
6. 修正师范学校规程	(173)
7. 职业补习学校规程	(183)
8. 短期职业训练班暂行办法	(184)
9. 创设县市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实施办法	(185)

附录：

第六章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与奴化教育

(1840—1949 年)

一、帝国主义文化教育侵略的背景与本质	(187)
二、通过教会在中国举办职业教育	

进行文化渗透	(188)
三、敌伪职业教育	(192)

第七章 革命根据地的职业教育

(1927—1949 年)

一、革命根据地教育宗旨与方针政策	(195)	1. 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	(222)
二、学制	(199)	2.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223)
三、学校设置与设施	(204)	3. 中央农业学校简章	(225)
四、科类与课程	(209)	4. 短期职业中学试办章程	(226)
五、教员、学生与毕业生出路	(213)	5. 高级师范学校简章	(227)
六、教育行政管理	(216)	6. 初级师范学校简章	(228)
七、根据地教育经验	(220)	7. 短期师范学校简章	(228)
附录:			

第八章 新中国成立,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接管改造与调整整顿

(1949—1952 年)

一、背景	(229)	附录:	
二、方针任务	(230)	1. 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1952 年 3 月 31 日)	(242)
三、接管改造	(230)	2. 中等技术学校暂行实施办法(1952 年 8 月 29 日教育部发布)	(243)
四、调整整顿	(232)	3. 师范学校暂行规程(草案)(1952 年 7 月 16 日教育部颁布试行)	(246)
五、加强教育立法、明确办学要求	(233)		
六、领导管理、职责分工	(240)		
七、中等专业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	(241)		

第九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1953—1957 年)

一、背景	(256)	八、体育、卫生工作与军事训练	(274)
二、任务与方针	(257)	九、学生与教师工作	(276)
三、建立中等专业教育制度	(258)	附录:	
四、发展与调整中等师范教育	(263)	1. 政务院关于改进中等专业教育的决定	(283)
五、建立技工教育制度	(265)	2. 中等专业学校章程	(286)
六、领导管理、职责分工	(268)	3. 技工学校暂行办法(草案)	(290)
七、思想政治教育	(270)		

第十章 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期间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调整和发展

(1958—1965 年)

一、背景	(292)	二、任务与方针	(293)
------	-------	---------	-------

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294)
四、职业技术教育的调整	(298)
五、职业技术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308)
六、招生工作	(312)
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14)
八、教育经费	(315)
九、领导管理机构的演变	(316)

附录：

1. 周恩来：重视中小学教育和职业 教育	(317)
2. 中等专业学校专业目录	(318)
3. 技工学校通则	(330)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职业技术教育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一、背景	(331)
二、职业技术教育在动乱中	(332)
三、职业技术教育的浩劫	(335)
四、在动乱中恢复的职业技术教育	(340)
五、职业技术教育受破坏而造成的 恶果	(345)
附录：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科教 组关于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办 学中几个问题的意见	(347)

第十二章 新时期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1976年10月—1988年)

一、背景	(349)
二、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	(351)
三、教育体制的改革	(353)
四、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441)
五、对青壮年职工的教育和培训	(418)
六、青少年就业训练	(420)
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422)
八、师资队伍的建设	(428)
九、经费	(433)
十、科学教研工作	(435)
十一、对外交流	(438)
附录：	
1. 中等师范学校规程(试行草案)	(441)
2.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 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	(447)
3.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全国中等专业教育工 作会议纪要	(450)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 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	(452)
5. 教育部 劳动人事部 财政部 国家计委 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 教育的意见	(454)
6.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 加强和改进中等专业学校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 几点意见	(457)
7.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461)
8. 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转发 《技工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	(466)
9. 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转发 国家教育委员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职务试行 条例》及《实施意见》的通知	(469)
10. 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转 发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 等文件的通知	(472)
11. 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转 发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教委《实验技术人员职 务试行条例》及《实施意见》的通知	(475)
12. 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职业中学专业 课教师职务聘任工作的补充意见	(477)
13. 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关于制定和修 订中等专业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	(480)

订全日制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四年制)教学计划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478)	16. 劳动人事部 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颁发技工学校工作条例的通知	(489)
14. 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试行关于制订职业高级中学(三年制)教学计划的意见	(480)	17. 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	(493)
15. 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颁发《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设置暂行办法》的通知	(482)	18. 全国职业中学专业(工种)目录(国家教育委员会职业技术教育司汇总)	(497)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展望

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职业技术教育 深化改革和大发展	(506)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的决定	(507)
-----------------------------	-------	------------------------	-------

中国职业教育大事年表

一、清末洋务运动至辛亥革命 (1862—1911)	(511)	三、革命根据地时期(1927—1949)	(520)
二、民国时期(1911.10—1949.9)	(514)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1988)	(525)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统计资料

一、中等专业学校基本情况	(543)	六、技工学校基本情况	(551)
二、中等专业学校数	(544)	七、职业中学基本情况	(552)
三、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数	(545)	八、成人职业技术教育基本情况	(553)
四、中等专业学校分科招生数	(547)	九、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基本情况	(554)
五、中等专业学校分科毕业生数	(549)		

附：台湾技术职业教育简史

前言 台湾经济和教育简况	(555)
一、光复后整顿时期的职业教育	(556)
二、计划建设时期的职业教育	(557)
三、实施九年国民教育后的职业教育	(561)
四、技术教育	(568)
五、职业训练	(571)
六、台湾职业技术教育界在研讨中提出 的问题和建议	(572)

附资料：	
1. 台湾《职业学校法》	(574)
2. 台湾《职业学校规程》	(575)
3. 台湾《职业训练法》	(578)
4. 台湾《专科学校法》	(581)
5. 台湾《专科学校规程》	(584)
6. 加强高级职校轮调式建教合作教育 (训练)实施要点(核定本)	(586)
7. 高级职业学校办理“轮调式建教合作 班”作业规定	(589)

引 子

教育(包括职业技术教育)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着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积累了经验、获得了技能之后,就需要通过教育的形式,将其传播下去,以此保证历史的延续和社会的进化。

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对古代的部分,本书只在引子中作简介。早在先秦时代的一些古籍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对农业和手工业等方面的职业技艺传授的记述。从中国的古代社会开始,即出现过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与能工巧匠,他们丰富的创造发明,通过教育实践,留传后代,发扬光大,有着光辉的业绩。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科技成就即闻名于世界,四大发明——指南针、纸、印刷术和火药,即传于西方。丝织、陶磁、铸冶技术、医学、建筑等方面的成就也为世界所赞誉。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社会实践的丰富,职业技艺的传授和教育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现在,让我们作一简要地历史回顾即可窥见一斑。

原始社会即存在着生产和生活技能的传授

在原始社会里,所谓教育活动主要是指一些有关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技能、经验的传授。在陕西半坡村发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有石斧、骨锄,居室内还发现一陶罐粟,说明当时的仰韶人已经有了简单的生产工具,而粟已成为他们的重要食品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遗址村落的布局规划得很整齐,其中有供公共活动的大房子,据考证,这大房子是供氏族集合使用的,也是老人对儿童和青少年们进行教育的场所。教育内容主要是劳动技术、传统习俗、祭祀祖先的礼仪等。看来定居式的农牧生活,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增多了。当时虽无专门从事教育的“师”,但由德高望重、有丰富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的氏族中的老人来作教育者是很自然的。通过教育活动,提高了氏族成员的素质,巩固和发展了氏族。

商代孕育着学徒制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出现了两大对立阶级,教育自然又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当会传播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道德观念;此外,也总要传播一些生产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以维护和发展社会生产。

商代称在屋下做工的罪人叫宰,这即是手工业奴隶。商朝的百工各占有一批技术奴隶,用以生产各种手工艺品。百工的专门技术是父子授受的,他们只在父子间世代进行,并不外传,当百工掌握了手工业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便率领指导着奴隶们生产劳动。这样在其手工业作坊里就开始孕育着学徒制的教育形式。在郑州发掘的商代遗址中不仅有居民住宅区、官家奴隶主住宅区,而且还有商业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在作坊区里发现有一个作教具的陶范,存放在一间房子当中,可以说明是在进行技术教学用的,不同的是手工业奴隶们的技学习是强迫进行的,不是自愿的师徒关系。殷、商的庠是习礼的地方,序是孩子们学习射箭的地方,庠和序中的教育活动,可说是一种初级形式的技术教育活动。

周代专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周代作战以兵车为主,因而奴隶主阶级必须训练制造战车的工匠和在战车上作战的兵士。当时书、数的教育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传说《周髀算经》已被作为教材,这应该是最早的专业教材。

西周王朝曾经几度迁都,每次迁都都由司空统筹规划、设计施工,工程规模很大。司空还需要先培训一批中、上级的施工、设计人员,由他们再去训练建筑奴隶。这样建筑奴隶的住地和工地自然就成了教学的现场和实习的场所。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处于世界的前列,医学、建筑、军工、天文、地理、数学等等,当时都有极高水平。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也推动了专业技术教育的兴起。被誉为土木工匠祖师的鲁班,对于传授工匠技艺即有卓越成就;精医扁鹊有弟子子阳、子豹二人跟随行医四方;墨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而且也是位优秀的手工业工人,他会造车,善造守城器械,他的弟子有300人,多出身于下层庶民,其所用教材即为《墨经》。《墨经》中有形学、力学、光学知识的研究、记录,论阴影、论反射、论光的直线进行性质、论小孔成像、论平面镜、球面镜等,是一部早期完整的光学专著。他教学注意实用,要求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也很注重德育,他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可见那时不仅学徒制的传授技艺方式已经比较普遍地开展起来,而且专业技术教育也更趋完整。当然那时主要还是在民间进行的。

汉代官学和私学中有了高级的专业技术教育

汉代太学生的学习比较自由,主要靠自学,除正课外还允许随个人的兴趣进行研究,有的太学生在课外研究科学技术,如张衡、崔瑗等在课外从事天文学和数学的研究,而且很有成就。这些太学生在学成或成名后,还可以收弟子进行科技方面的教学活动。当时,名师大儒讲学授徒的风气甚为兴盛,他们自立“精舍”、“精庐”等私家学院开学授徒。地方有志青年就读官学机会不多,而民间私学不受官学限制,又可研读众多的专业技术,故从者甚众,有的门徒常数百人、数千人,甚至有的著录弟子多达一万六千人。这是高级的专业技术教育。

公元178年,东汉灵帝年间(光和元年)始置鸿都门学,学生由州、郡三公荐举,共有千人之多。这是我国设立高级文学艺术专门学校的开端。

唐代有了健全的专业技术教育体系

唐自开国到天宝末百余年间,中央和地方的专业技术教育门类齐全,学制完善,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体系。除官办的外,尚有半官半民性质的,有中央设置的和地方设置的。如四门学是半贵族半庶人性质的,律学、书学、算学则招收八品以下官吏及一般庶人的子弟,入学年龄宽为18岁至25岁(国子学、太学为14岁至19岁)。唐代从中央到地方还开始设立了医学,分科培养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等,都有相当的办学规模。

唐代的教育将教育、研究、行政三者结合起来,这样效率较高,又利于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和加强管理。如太医署、司天台、太仆署、太乐署等,都兼有这三个方面的功能。官方对教育的管理也很重视,有关入学资格、学生名额、学习年限、教学内容、教师编制以及成绩考试等,都有明确详细的规定,即使对学生的给假、升等、罢归等,也都订立了严格的制度。

专业技术教育的不断扩展

宋代的学校除太学、四门学、律学、医学、算学及书学外，还增设了武学和画学，置内舍生最多时曾定为900人。在教学方法上也有所改革，创立了“三舍法”：初入学者为外舍生，经过考试升为内舍生，再经过考试升为上舍生。这样将太学生分为三等，逐步淘汰，以选取优秀人才，提高培养质量。

元、明、清（上中叶）的学校设置也大致如此，但其办学规模及学科设置都在不断扩展，各项制度日趋健全，要求也更加严格。

元世祖初年，在地方诸路设置了医学，后来又注意检查考核医生平日的学习成绩。到了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始置诸路阴阳学，是培养训练天文、算历方面人才的学校。

明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水平，远远超过了元蒙统治时期，高产农作物、经济作物等普遍种植，冶炼、丝织、棉纺等都有较高的水平，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出现了手工业脱离农业而独立发展的趋势，涌现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科技著作，这些都促进了专业技术教育的发展。1369年（洪武二年），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从此，除中央学校外，又大建地方学校，规定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员；同时设置训导、府学四员，州学三员，县学二员。学生名额定为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30人，学生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

清代自1789年（乾隆四年）起，国子监还增设了算学专科，分线、面、体三部。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专业技术教育是在不断扩大，设科也日益分细；当然那时的学校地位只是科举的附庸，入学实为取得应试的资格，至于生产技术知识的教学，不可能占有大的比重。我国长期是封建社会、农业经济，官方以儒学统治教育，技艺教育被轻视，发展必然受到限制。

近代学校的职业技术教育始于西欧

近代学校的职业技术教育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是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的结果，是适应社会进步的一种教育形式。

十八世纪开始出现机器生产，带来了生活条件、劳动内容以及生产组织结构的根本变化。劳动者参加生产以机器为起点进行专门分工，需要具有物理的、化学的与数学的普通文化科学知识，以及懂得机器的工作原理并具有生产应变能力；此外，由于大工业生产的智力要求在增长，又产生了技术的管理、调节、监督的新的职能和此类人员的新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后备力量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补充，如果还是只靠师徒制的培养教育，无论其规模、速度以及内容上，都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而要有新的传授生产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方式和手段。于是在一些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等国，先后出现了职业技术学校。这种专门的职业技术教育机构的出现，迄今不过二百年的历史，但其优越性显而易见是大大胜于学徒制的教育形式，成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最主要的手段，引起了教育制度、内容和方式的一系列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创建

中国近代职业技术教育，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从清末洋务运动中开始的。十九世纪下叶，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国家门户洞开，清政府兴洋务运动，从西方

引进机器工业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近代学校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从此我国职业技术教育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章 实业教育的萌芽 (1862—1902 年)

从 1862 年(清同治元年)洋务运动创设北京同文馆始,至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建立实业教育制度,可谓近代中国实业教育的萌芽期。

一、背景

清末至民国初叶,是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向资本主义新文化过渡的重要阶段。新教育的产生背景则可追溯到 1840 年的清末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由封建社会沦为受列强凌辱与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国际地位非常低落,国内社会危机也日益加剧。国家民族的灾难与国内的重重矛盾,激荡着时代的变革。首先在知识界孕发了一股近代资产阶级爱国进步的启蒙思潮。一些先进人物起来抨击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要求改革。在教育方面,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心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提出改革空疏无用的科举教育。这一思潮的先驱者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最先倡导“经世致用”的教育,主张改革,开拓新学。龚自珍(1792—1841 年)在《上大学士书》中称:“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于晚清思想解放确实有功,并为诸新学家所崇拜。林则徐(1785—1850 年)提出:“向西方学习”,“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学习西方制造“船械、枪炮、量天尺、千里镜、火轮车、自来火、千斤秤、风锯”,以抵制西方侵略。他编的《四洲志》稿本是中国近代介绍西洋各国概况的最早的著作之一,他被誉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1774—1857 年)根据林则徐的《四洲志》稿扩编成《海国图志》一百卷,主张学习外国人的长处,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提倡汲取西方科学技术,办新式工业,抵抗外来侵略。以上主张,当时虽未能唤起统治者的警醒,但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直至鸦片战败 21 年后,在英法联军侵略的刺激下,学“西学”求“自强”的呼声日渐笼罩朝野。

(一) 太平天国的新教育思想

1851—1864 年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对改革清末空疏腐化教育的思想和实施,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太平天国革命家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实行革命的反封建的和人民大众的教育,为建立革命政权服务。在教育制度上,实施普遍的、平等的教育,并沿用科举的形式,而内容则废除儒家经典,以太平天国出版的官书为依据,改革旧科举,实行新科举。考试和授官职不分男女贵贱门第出身,一视同仁,机会均等,“无虑布衣绅士、倡优隶卒”、“无论何色人,上至丞相,下至听卒,均准与考”。为了罗致人才,除定期科

举外，还实行招贤制和保举制，出“招贤榜”广招文学、科学、武艺、医务人才和木匠、瓦匠、铁匠、吹鼓手等艺人，“你有那长，我便用那长”（1853年，天京《招贤榜》），一材一艺，均予录用。

太平天国除重视政治、宗教为中心的教育外，各级军政首领还重视生产劳动教育和提倡科学技术教育。生产劳动教育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农业方面规定“每年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奉尚，即每人每年的收入，除日用外，余均缴纳国库，以使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对努力生产的“力农”，则加以奖励；对“惰农”则予以惩罚，以“力农”作为“圣”、“良”的一种道德标准。建国后两次修订历法，废除旧历中的封建迷信内容，传播农业科学知识。手工业生产劳动方面，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二十五家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组织生产，互相琢磨，以促进手工业生产。在儿童教育中创立“带徒弟”的制度与方式，各级军政首领常收养许多儿童作义子，对其传授各种必要的知识技能。在军事重于一切的时期，主要的教育包括有武艺的传授和政治、宗教理论的学习。太平天国领袖们要求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把科学技术列为“三宝”之一。对诸如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均加以重视。他们认为将来在中国境内“可以随便用汽船、铁路、电线及其他西洋机器而无碍”（《太平军纪事》）。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就是中国近代最早努力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他们尽力吸收和培养如“通晓天文星象算学者，习知地理山川形势扼塞者，熟读孙武书知兵法阵图者，熟悉风土民情利弊者，……医士之能内外科者。”（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志第十）领袖们也带头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英人呤唎（A. F. Lindley）在太平军中服务多年观察所得，称“干王、章王全都熟悉地理和机械学，还收藏有许多关于西方文化和科学的附有插图的参考书，他们是经常研读这些学问的。”（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186页）。1860年，容闳曾向太平天国领袖建议设武备学校、海军学校、颁定各级学校制度和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等。这些均早于清洋务教育之前。

（二）洋务运动始创新教育举办技术学堂

清末二次鸦片战争后，出于国防与外交上的需要，由一部分带有封建买办性质的“洋务派”官僚奕訢、曾国藩、李鸿章与张之洞等出来搞“洋务运动”，推行“新政变法”，主张“师夷技”，以谋求“自强”、“致富”。清政府为办理洋务，于1860年（咸丰十年）依恭亲王奕訢所奏，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统筹洋务的中央机构。奕訢认为“务得西人之秘”以为日后“安内攘外”之本。文祥亦说：“使西人善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左宗棠称：“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洋务派一面购买洋枪洋炮，同时重金延聘洋专家洋教习，采用西方技术开办工矿企业，制造船舰枪炮与机器，筑铁路、通邮电、开发矿藏；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上没有相应的技术才才，便在教育上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以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方针，学习西方教育，创办技术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出洋学习，双管齐下，培养技术人才。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校教育的开端和教育与工业生产结合的肇始。

作为中国新学校教育先声的是1862年8月（清同治元年七月）总理衙门奕訢奏设的北京同文馆，用以培养翻译与办理外交事务的人员。以前西方各国与中国往来的文书通常用中文，从1860年中国的首都被迫开放容许外国使节长住，以及1858年中英续约中第50条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文”以来，各国竞相效尤，为此，需要有通晓外文的人员。奕訢奏称：“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请饬广东、上海

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即以此学为同文馆。”次年，江苏巡抚李鸿章继又奏设上海同文馆（1869年改名广方言馆），1864年两广总督瑞麟也奏设广州同文馆。以上均属培养承办洋务的译员学校，可谓中国文科职业技术教育之始。至于工业技术方面的学校，当首推1866年6月（同治五年五月）由左宗棠奏设的福建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用以培养国防需要的造船、驾驶技术人员。左称：“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均是人也，……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该学堂又于1868年另设船政艺圃作为对有希望成为领班的徒工进行在职教育场所，成为中国最早的技工教育设施。此后，洋务派陆续举办了一批专门学堂。

（三）“戊戌变法”创设农、工、商实业学堂

甲午战争后，中国创钜痛深，国势危如累卵。国人对比东邻日本同是在学习西方推行维新而走向强盛，一兴一衰，更激起爱国救亡思潮，纷纷议新政，谈新学，导发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新观念认为国家富强之本不尽在军事实力，而在经济上振兴实业，“振百工以预民用”与“振兴商务”以及在教育上要造就人才，“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光绪皇帝拔擢新进人才支持下掀起“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对向外国学习的认识有了发展，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他们不仅主张发展实业，而且提出从政治上变法维新，学习西方“设议院，达民情，君民共主”。并把兴学育才作为核心。主张“创新政，废科举，强新学，广设学校。”甲午战争失败后，承认“日本讲求西学，大著成效”，教育方面从效法西方转向东方日本，仿日本的教育模式与规章制度。康有为称：“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战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今天下之治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其农工商皆有专门之学……盖有一民即得一民之用”。他主张注重工艺教育，以声、光、化、电学科为重点，设器、艺等科技学科，还要求把中国“定为工国”，做到“民智大开，物质大进”，“立国于世，有恃无恐”。他提倡商学，“国中有商，学以教之，有商报以通之，有商部以统之”。梁启超称：“日本变法，以学校为先”，农工商实学为本源，“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乎？”“主日后专习何业，则只分设学堂。如轮船公司，则有管轮学堂也，驾驶学堂也。……电报则有电报学堂也，丝业则有蚕桑学堂也，制茶、制糖、制磁、制酒，制一切食用各物，无不有学堂。开煤、炼钢，则有煤铁学堂也。纺纱、织布则有织作学堂也。……每创一业，开一厂，设一局，均应附设一学堂，或独立创兴，或数家合办。学成后入船入厂习练有成”，“是以造诣宏深，人才辈出，……遂能创开大利之深，尽奇华民之业。”“戊戌变法”虽不过百日而中折，但它对开拓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文化思想，推进封建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兴办农工商实业学堂成为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最早兴办并有较大影响的实业学堂当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杭州太守林启创设的杭州“浙江蚕学馆”。中国蚕丝业原居世界之首，而浙江蚕丝又为中国之最。但历代封建统治对蚕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致使天下“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严重打击了蚕业生产，加上技术与生产设施墨守旧规，蚕病猖獗遍及全国，民间养蚕连年歉收，“出丝不旺”，生产锐减，蚕业中衰，难与西方和东邻日本竞争。从1889年至1896年，中国出口丝比前减少200万斤，民间应短银580万

两,海关税 20 万两,八年合计为 4800 万两。林氏等有鉴于此,认为振兴浙江实业应以蚕丝业为主,而发展蚕桑生产又非创办蚕业教育培养专才不可。

1898 年,康有为奏请设立各省农务学堂,光绪帝诏兴农学:“著各省府州县设立农务学堂”,并“劝谕绅民兴农”。此事虽以政变遭挫折,但为提倡地方普遍设立农业学堂开了先例,也是采取鼓励绅民兴办实业学堂的开端。至于工、商、矿各业实学,则由于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逐步解体,且因洋务官办工业的破产,国内“振兴实业、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的舆论高涨,迫使清政府对商办企业作了有限的让步,颁布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官督商办与民族资本工商业有了初步发展。据统计,1895—1900 年(光绪二十一至二十六年),全国私人资本新办的工矿企业创办资金在一万元以上的有 104 个,总资额达 2300 万元,为甲午战前二十多年间私人资本 730 万元的近 3.2 倍。清政府也于 1898 年在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分局。工商企业的发展相应地需要各种技术与管理人才,促使工、商、矿业等学堂继续发展。

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发轫于鸦片战争后,而盛行于清光绪后期,是中国从古老的封建士大夫教育迈入近代教育过程的新教育观念,是清末民初教育的共同思想。这一思想在当时对新教育制度的建立和使全国旧书院转化为新式学堂有良好作用,它促使中国教育近代化。

对“中体西用”的论述最系统、最透彻的当首推张之洞,并可称之为奠基人。梁启超曾经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中国近 300 年学术史》第 71 页)。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势,张之洞遂被视为中国近代的柱石,也是他对中国政局与教育最具影响的时期。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1898)中阐述,“今日学者必先通经”,“学堂之法有五要:一曰新旧并学。四书五经、中国史学、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又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则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并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治世变,不必索之经史,而必无悖于经史。”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面上将中西学等量齐观,实际态度是在维持封建旧传统的前提下,酌取西学西法,以求完成中国近代化,免于沦亡之祸。后来,梁启超也曾提倡“中体西用”,他说“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之不相入也。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前者各学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皆由于此。”

“中体西用”基本上是“以西学缘中学者,态度都是保守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 64 页)。本位是封建的纲常人伦,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传统。对此,封建皇朝与占统治地位的士大夫阶层是决不想主动放弃的。传统中学与西学毕竟是圆凿方枘,但在当时封建旧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它代表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减少了在讲求西学以图存的过程中的阻力,易为当时社会各方面所接受。张之洞的《劝学篇》为清帝所赏识,并命军机处予以刊布教导各省督抚学政。